

韩非子研究的回顾

〔香港〕 郑良树

韩非在《显学》里曾经指出，当时天下的显学有儒、墨两家；实际上，以当日政治发展及国际局势而言，法家及纵横家才是天下的显学。秦以后，墨家衰落；汉一统天下，纵横家也日渐式微；自此以下二千多年来，天下的显学除了儒家，就是法家了。这一点，恐怕是韩非始料不及的。

战国法家著作里，以《商君书》及《韩非子》二书保存得最完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商君书》二十九篇，今本《商君书》二十六篇，就中二篇有目无文，实存二十四篇，较《汉志》著录少五篇；《汉志》著录《韩非子》五十五篇，今本即五十五篇，篇数相符。因此，研究法家思想，《商君书》及《韩非子》是两部很重要的书。

《商君书》尽管保存得比较完整，然而，属于商鞅本人亲著的篇章毕竟不太多，大部分作品都是由他的学生及更晚的追随者所完成的^①，所以，本书应当被视为商鞅及其学派的著作，跨越的年代相当长。至于《韩非子》，除少部分真伪可疑外，大部分应当被视为韩非本人的作品，有的著成时代早，有的时代晚^②，跨越的年代不过数十年而已。因此，在《商君书》及《韩非子》二书中，又以后者的地位更显著。

《韩非子》大约于嬴秦统一天下前后编成，在编辑过程中，也附入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及其他资料^③。编成之后，终汉代为

止，它不断引起学者们的注意，《淮南子·泰族》言及韩非，《盐铁论》在《刑德》及《申韩》辩论了韩非的思想，扬雄在《法言·问道》非议了韩非，此外，王充有《非韩》，刘陶有《反韩非》^④，孔鲋更有“韩非非圣人”的言论。总而言之，在讨论社会及政治等课题时，它成为学者们喜爱征引及评论的对象。

“韩非子学”开始成立，应该在南北朝的时候。《魏书·刘昺传》说：“昺著《三史略记》……，注《周易》、《韩子》、《人物志》、《黄石公三略》，并行于世。”^⑤刘昺是北魏世祖时人，是迄今所知最早注解《韩非子》的学者，可惜其《韩子注》已经失传了。唐代尹知章有《韩非子注》，卷帙不详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谓“尹知章注《管子》三十卷，又注《韩子》”，惜“其亡久矣”^⑥。今《韩非子》乾道本有《旧注》，不署撰著人，王应麟曰：“《韩子》今本五十六篇，注不详姓氏。”^⑦可知乾道本之《旧注》，宋人已不详其出处矣。王先慎说：“宋乾道本《注》，不题姓名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事类赋》、《初学记》所引注文，与乾道本《注》合，则其人当在宋前。”推论《旧注》作者当为宋以前之人，颇有道理。陈奇猷说：“元何犛《校韩子序》云：‘臣犛所校雠中秘书，有《韩子》五十三篇，与处士臣，谦家藏本无异，旧本有李瓚《注》，鄙陋无取，臣犛尽为削去。’……是何犛明言今小字注出于李瓚。”^⑧即推断《旧注》为李瓚所作，李瓚时代无可考，似应当是唐以前的学者。^⑨综合上文的叙述，可知北魏以后，“韩学”的主流是集中在本书的注解上。

宋人好写评论文章，韩非自是一个适当的评论对象。欧阳修有《论申韩》，苏氏兄弟也分别撰有《韩非论》；此外，晁公武、高似孙及黄震分别在他们的著作里发表一些议论，讨论韩非其人及其思想。这些文章，都继承自汉人而有所增损，并非“韩学”的主流。元朝末叶，《韩非子》又有何犛《注》一种，根据赵用

贤的说法，此本只五十三篇^⑩，稍有残夺。不过，在宋、元较为沉寂的“韩学”领域里，算是一花独放了。

明以后，校订本及评点本纷纷涌现，“韩学”掀起了新的热潮。刊校本著名的有赵用贤依宋本刊行的校本，以及受赵本影响的张榜本、凌瀛初本、赵如源与王道焜合校本、孙钜本及黄策本等等。至于评点方面，参与的学者有杨慎、门无子、孙钜、焦竑、陈深、陆可教等人。在“韩学”的形成发展中，明朝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。

清人治经之余，旁及诸子，随着子学的遍受重视，“韩学”也逐渐汇成一条大江；更由于西洋法治思想的输入，“韩学”这条大江更是气势汹涌，一泻千里。这条大江有两条主流及一条旁支。最大的主流是对《韩非子》的整理和校订，参与其事的有惠栋、戈襄、唐岳、胡思敬、冯舒、翁同书、李慈铭、王念孙、孙毓修、王允升、顾广圻、黄丕烈、王引之、朱锡庚、俞樾、孙诒让及陶鸿庆等人。他们或片言札记，或积说成卷，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，对于研习、探究《韩非子》，有着莫大的裨益。另一条主流是重镌翻刻的盛行，踵继明人的余绪，影宋钞本、吴鼐本、二十二子本、汪氏编印韩晏合编本、指海本及衍星社排印本等，都在这个时候刊布，对于“韩学”的影响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继承汉、宋遗风，清人对韩非也写些议论性质的文章，也做些点评的工作。前者有陈祖范、梅曾亮、陈澧、俞樾及章炳麟等，后者有王友光、钱陆燦及吴汝纶等、他们可以说是“韩学”的支流了。到了晚清光绪二十二年，王先慎汇集清人众说于一编，撰成《韩非子集解》，集清人“韩学”之大成。此书瑕瑜纷陈，论断亦嫌薄弱，成绩在其兄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之下。然而，在新的集说还未出现之前，还算是一部方便之作。

进入本世纪，“韩学”始而场面清冷，随后即逐渐炽热，到了七十年代，竟成为“最热门”的子学之一，与儒家平分秋色，

备受“尊宠”。试阅下列统计表：

本世纪韩学作品发表件数统计表^①

年代	十	二十	三十	四十	五十	六十	七十	八十	共 计
件数	3	9	39	23	41	88	441	164	808

除了四十年代因为战争的关系出版件数下跌之外，其他各年代都以相当的速度递增。到了七十年代，韩学竟成为时代宠儿，发表件数作五倍增长。八十年代韩学才走回头路，恢复正常的发展。

底下，我们准备从几方面来讨论本世纪以来韩学的成绩。

（一）对其人其书之评介及考订

在评介韩非其人及其著作方面，最早出现而份量又可观的应该是谢无量的《韩非子》（上海中华书局《学生丛书》）。此书出版于1932年，今编入《无求备斋韩非子集成》内。全书分两编，上编评介韩非学术渊源，下编评介其学说，是一部相当全面的著作。时代稍晚而又有可观的成绩的，有任继愈的《韩非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4年），全书分六章，从韩非时代、生平及著作，一直介绍到他的无神论思想，是一部采取“新观点”而撰成的新作品。

有关韩非生卒年的考订，这个时期出现了两篇重要的论文。陈千钧在《学术世界》第一卷第二期中，发表了《韩非新传》，对韩非生卒年提出新颖的见解。几乎就在陈文发表的同时，钱宾四先生完成了《韩非考》，对相同的问题提出另一种看法。陈、钱的意见，迄今还是讨论韩非生卒年的重要基石。此外，像陈祖厘：韩非别传（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第二卷第四期，1933年）；王举忠：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（《辽宁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一期）；晁福林：司马迁论韩非之死（《史学评林》1982年第三、四期）；

邓廷爵：关于《韩子·初见秦》的作者与韩非之死（《学术月刊》1982年第三期）；龚维英：试析韩非之死（《中国史研究》1983年第二期），都是有可观的见解的论文，值得参考。

有关《韩非子》其书的评介，张素贞的《韩非子导读》（在《国学导读丛编》内，1979年）及徐汉昌的《韩非子释要》（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1986年），应该是初学者两本比较理想的入门书。傅锡壬撰有《韩非子解题及其读法》，发表于《学粹》第十八卷第六期（1976年12月），也可供参考。张素贞又有《国家的秩序——韩非子》（在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内，台北《中国时报》，1981年）一书，则比较偏重于韩非政治思想的介绍，可作为初学者了解韩非思想的入门书。另外，陈千钧：历代韩学述评（《学术世界》第一卷第十一期，1936年）；陈启天：韩非子参考书辑要（上海中华书局，1945年）；韦日春：六十年来之《韩非子》学（《国学》第四期，1974年6月），是有关韩学回顾之类的参考著作，尽管二陈两篇的作成时代距今略远，也还有参考的价值。

此外，像下列几本书：王世瑄《韩非子研究》（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8年）；谢云飞《韩非子析论》（台北大林书局，1973年；东大图书有限公司，1980年）；吴秀英《韩非子研议》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年）；赵海金《韩非子研究》（台北正中书局，1982年五版），虽然书名是“研究”、“研议”及“析论”，但是，也属于评介性质的书，适宜初学者参考。

在这许多供初学者参考的书当中，赵海金、谢云飞、张素贞、徐汉昌及吴秀英的著作迄今坊间还可以购得；谢无量及王世瑄的已编入《无求备斋韩非子集成》内，重新刊行，坊间亦可购得。

（二）注释

八十年来，在《韩非子》的注解方面，无疑地取得空前的

成绩，这也许是近代韩学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早在1919年，尹桐阳在武昌出版了《韩子新释》，全书共二十卷，是继王先慎之后，对本书作全面性注解的一本巨著。其后，踵其事者有：叶玉麟《韩非子白话句解》（上海广益书局，1937年）、陈启天《韩非子校释》（上海中华书局，1940年；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9年增订本）、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（中华书局，1958年；台北世界书局，1963年）、梁启雄《韩子浅解》（中华书局，1960年）、邵增桦《韩非子今注今译》（台北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）、“韩非子校注”组《韩非子校注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）。在不算太长的八十年里，全面性的注解著作一共出版了七部；如果陈启天的《增订本》作新著计算的话，则有八部之多了。平均每十年出版一部，可见此书备受重视以及学者们的努力了。

八部著作中，陈启天《韩非子校释》（包括《增订本》）在篇章的编排上自成一系统，陈氏《例言》说：“《韩非子》之旧有篇次，稍嫌杂乱。兹依各篇内容重新编次，分为十卷，以其最重要者置于前二卷，其不重要或确有可疑者，则置于后，以便阅者选读。”可知作者撰著此书时，对五十五篇曾作过重新编排的工作；邵增桦的《韩非子今注今译》，即陈氏系统的延续。对初学者来说，这种差别是不可不知的。叶玉麟的《韩非子白话句解》是比较特别的一部书，书中除少量的注释之外，各篇皆翻译为白话文。这是《韩非子》最早的一个白话译本。

在选注方面，最早的本子应该是唐敬杲的《韩非子选注》，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列入《学生国学丛书》。以后陆续出版、发表的有：吴则虞《韩非子选注译》（北京中华书局《中国历代哲学文选》之一，1964年）、王焕镛《韩非子选》（中华书局，1965年）及李伯鸣《韩非子选释初稿》（香港《联合书院学报》第三期，1964年），或仅注释，或兼翻译，颇便于初学者。到了七十年代，中国大陆兴起了单篇注释的风气，而且都集

中在某些特定的篇章。试读下表：

七十年代大陆韩非子单篇注释篇名统计表

篇 名	孤 愤	难 势	问 田	定 法	五 蠹	显 学	寓言故事
次 数	4	2	1	7	18	2	11

这些注释，尽管在内容上有全篇注释或节选注释的差异，在性质上有注评及注释兼翻译的不同，不过，它们似乎都带有某种“特别意义”。

（三）整理及考订

整理方面，主要是训诂及校勘。八十年来，参与其事的学者相当多，有孙人和、刘师培、孙楷第、刘文典、于省吾、金其源、高亨、李笠、王叔岷先生、陶小石、严灵峰、龙宇纯、赵海金等十余家，曾为全书作集释的陈启天、陈奇猷及梁启雄等人，在他们的著作里实际上也展现了这方面的成果。继清人之后，他们贡献出宝贵的精力，或作片言只语的校正，或作一字一句的训释，使得本书时代愈晚愈容易理解，应该说是他们以及清人的功劳，值得我们赞许和敬佩。

考订方面，分单篇考订及全书考订两种，包括了作成时代、真伪、题旨性质及与他书关系等课题。发表过单篇考订的学者有刘汝霖、高亨、容肇祖、郭沫若、冯友兰、曾繁康、周法高、谌贻祝、严灵峰、雷金波、王静芝、彭升荣、汪玉笙、牛鸿恩、高柏园、赵海金、高伟谋、朱守亮、张素贞、栗劲及笔者等二十余人。在这二十余人当中，接近三分之二的人都讨论了《初见秦》的作者及其出处等问题，可见本篇之备受注意及影响重大。

至于对全书作者考订研究的，主要的有容肇祖、梁启雄及潘

重规三家。容氏撰有《韩非子考证》，刊布于1935年；潘氏著有《韩非著述考》，发表于1966年。前者对全书各篇的真真伪伪，都作了相当深入的考订；后者则重点只在大部分篇章的考订上，并且对前者的意见提出批评和纠正。至于梁启雄，在他所著《浅解》的《前言》里，即曾对全书各篇的作成时代及真伪作概括性的论述，谨慎可取。因此，欲考究本书各篇的作者、真伪及作成时代，三书实不可偏废。另外，八十年代初期，周勋初发表的《韩非子札记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未对全书各篇进行考订，但讨论了版本、思想、篇章真伪、与他书的关系及许多其他问题，虽然有的课题尚有深入讨论的余地，不过将它列入“全书考订”的范围内，应当是可以的。实际上，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后的《附录》，讨论的范围也非常广，包括佚文、真伪、刻本源流、旧注、记载、生卒年及生平等，也应当列入“全书考订”的范围内，庶几乎才能突显其成绩，为士林所重。

（四）思想研究

思想研究大致上可分成两个阶段及两个地域。两个阶段，即六十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，六十年代以后为另一阶段；至于两个地域，一指大陆，一指台湾。

六十年代以前韩学思想研究的论著，无论是全书的概论，或者是某些篇章、某些思想的讨论，大致上都遵循着治学之道。例如：范寿康：韩非的思想（武汉大学《哲学与教育》第四卷第二期，1936年6月）；郭沫若：韩非子的思想（《先秦学说述林》，重庆东南出版社，1945年）；杨荣国：韩非思想探微（《新建设》第三卷第四期，1951年1月）；梁启雄：韩非思想述评和探源（《光明日报》1961年3月24日）；傅启学：韩非子政治思想（《陈百年纪念论文集》，1965年）；熊十力：韩非子评论（原署“胡拙甫”。香港人文出版社，1950年；学生书局，1984年）。这些作

品，无论是单篇或专书，大致上都自学术立场出发，所以，学术价值很浓。然而，六十年代以后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七十年代发表的四百多篇论文里，泰半都是“战斗文学”之类文章。有的作品甚至“一文两刊”、“一文三刊”、“一文四刊”，影响了当时的学风。

就大陆和台湾两个地域来说，大陆这数十年来的韩学一定程度上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，在台湾则出现了更多的韩学专著。试读这份书单：封思毅《韩非子思想散论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75年）；王静芝《韩非思想体系》（《辅仁大学文学院丛书》，1977年）；王邦雄《韩非子的哲学》（东大出版社，1977年，原为博士论文）；谭继山译《法、术、势——韩非子的强者理论》（星光出版社，1979年）；张纯、王晓波《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》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3年）；徐汉昌《韩非的法学与文学》（文史哲出版社，1984年三版）；张素贞《韩非子思想体系》（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1985年，原硕士论文）；蔡荣桐《韩非子思想管窥》（台湾书店，1988年）；卢瑞钟《韩非子政治思想新探》（三民书局，1989年）；黄瑞云《韩非法政思想批判——兼论近代法政思想之演变》（自印本，1989年）。

除了专书纷纷出版之外，我们也看到台湾大专院校对韩学研究的鼓励和提倡。自1970年至1989年，总计有十四位研究生通过韩学研究而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。其资料如下：吴宏安：韩非哲学研究（辅仁硕士，1970年）；张素贞：韩非子思想体系（师大硕士，1970年）；唐端正：韩非子思想述评（辅仁硕士，1971年）；万彬彬：韩非子思想评述（辅仁硕士，1971年）；黄金康：韩非子思想研究（辅仁硕士，1973年）；谢鸿仪：韩非思想形上基础之探究（文化学院硕士，1975年）；王邦雄：韩非政治哲学之研究（文化学院博士，1975年）；赵公正：韩非术论（政大硕士，1976年）；孙顺智：韩非实利思想之研究（政大硕

士，1977年）；郑仁淑：韩非子关系词研究（师大硕士，1981年）；王慧英：韩非子政治哲学之研究（辅仁硕士，1983年）；戴玉珍：韩非与道家思想（辅仁硕士，1983年）；宋瑋圭：韩非的法、术、势思想之分析与综合（政大硕士，1985年）；陈慧茵：韩非子板本研究（师大硕士，1985年）。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，从版本学到关系词，从思想体系到学术流派，可见韩学在台湾大专院校的“炽热”了。

（五）出版

七十年代末期，台北成文出版社刊布了严灵峰先生主编的《无求备斋韩非子集成》，使许多难觅的刻本、绝版的今注今释本、台湾无法流传的大陆注解本以及日本学者的著作，都藉此丛书而重见读者面前。严先生在《自序》里说：“本《集成》辑宋、明、清及日本之《韩非子》各种版本，分：白文、注释、节本、札记、杂著五类，计七十二种，六十九家，共五百九十有六卷。就中宋刊一种，明刊十四种，日本九种。”严先生以个人的精力，汇集古今中外韩学名著于一编，其魄力及气度，值得钦佩。该《集成》的刊行，无疑地对韩学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注：

①参阅拙作《商鞅及其学派》前编的考证，台北学生书局，1987年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
②参阅拙作《韩非的著述及思想》前编的考证，台北学生书局，1993年。

③同上，见《前编》之第三章《结论》部分。

④《后汉书·刘陶传》云：“陶著数十万言，又作匡老子，反韩非，复孟轲及上书……凡百余篇。”

⑤清秦荣光据以著录于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之《法家类》中。

⑥王先慎《韩非子集解·弁言》。

⑦王应麟《玉海·艺文·诸子篇》。

⑧见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页1167—8。

⑨陈启天则怀疑《旧注》为尹知章所作“而失名者”，见陈著《校释》页800。

⑩赵用贤《凡例》说：“元何猗至元中所进《韩子》止五十三篇，谓《奸劫》亡一篇，《说林》亡下篇，《内储说》下篇《六微》内《似微》以下亡数章，则世之不见全本亦已久矣。”

⑪此统计包括专书及单篇的作品，唯出版日期未详者，不在统计之内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俐）

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辨正一则

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史部·传记类）127页“女范编三卷 三册 国会 明万历年间刻本”条云：

是书亦名《古今女范》，上起周、秦，下至万历年邹元标妻事。每传一图，殊精绝。所记刻工如黄伯符、黄应瑞等，均有名艺林，为黄氏刻工之尤卓绝者。

按：此将黄伯符和黄应瑞并列提及，视若两人，当误。据《黄氏宗谱》196页载，应瑞为徽州黄氏第二十六世孙，字伯符，生于明代万历戊寅（六年，1578年），卒于崇祯壬午（十五年，1642年），享年64岁。父鏊，子一中，胞弟应泰、应祥、应地，是为黄氏三代传承雕版良工。据传本考知，应瑞参加刻的书，计有11种，其中万历年刻了10种，崇祯时刻了1种，可见其刻书活动主要在万历朝。刊年最晚的崇祯本《堪輿类纂人天共宝》，也许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。

•李国庆•